

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

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

(供 学 习 参 考)

一 九 七 四 年 八 月

前 言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运动，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批林必须批孔，不批孔，批林就不能彻底，反修就不能彻底，防修就没有保证。现在，批林批孔运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为了把这个运动深入、普及、持久地进行下去，最重要的是继续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努力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锐利武器。同时，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总结历史上儒法斗争的经验，也是十分重要的。

两千多年来，在我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儒家和法家的斗争。这一斗争一直影响到现在，继续到现在，还会影响到今后。儒法斗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虽然有着不同的阶级内容和政治思想内容，但都是两个阶级或派别，革新与守旧、前进与倒退两条路线的斗争。可是，长期以来，儒法斗争的历史却被历代反动派严重地歪曲和颠倒。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王明、刘少奇、林彪一伙，和苏修叛徒集团，以及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为了反对无产阶级革命，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也都大肆吹捧孔孟之道，恶毒攻击和咒骂法家，竭力歪曲和颠倒儒法斗争的历史。今天，我们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重新研究历史上的儒法斗争，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吸取历史上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经验，为现实斗争服务。这对于我们更清楚地认识

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增强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继续把社会主义革命推向前进是有很大帮助的。

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我们只有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历史上的儒法斗争进行历史的、阶级的、具体的分析和总结，对法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予以必要的肯定，才能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同时，我们要把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同研究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结合起来。“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历史上法家反对儒家的斗争也是在劳动人民的斗争推动下进行的。我们研究历史上的儒法斗争，还必须坚持“古为今用”的原则。我们研究历史不是为了向后看，而是为了向前看，为了反修防修。要把历史的经验同现实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紧密结合起来，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革命斗争需要建立一支宏大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我们一定要在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总结历史上儒法斗争的经验，深入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孔孟之道的战斗中，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建设，夺取批林批孔斗争的新胜利！

下面我们分三个历史时期，向大家介绍一下我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概况。

目

前 言	1
一、春秋战国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时期的儒法斗争	1
(一) 春秋时期的儒法斗争	3
(二) 战国初期到中期的儒法斗争	10
(三) 战国末期的儒法斗争	19
二、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封建社会中的儒法斗争	32
(一) 秦统一中国后到西汉后期的儒法斗争	34
(二) 西汉后期到隋唐时期的儒法斗争	45
(三) 宋元时期的儒法斗争	62
(四) 明清时期的儒法斗争	71
三、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儒法斗争	84
(一) 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时期的儒法斗争	86
(二)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时期的儒法斗争	93
(三) 辛亥革命时期的儒法斗争	99
(四) 辛亥革命后到五四运动前的儒法斗争	105
四、几点体会	113

一、春秋战国奴隶制向封建制 转变时期的儒法斗争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大变革时期。旧的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枷锁。在这种情况下，奴隶和奴隶主的矛盾更加激化，奴隶们纷纷起来进行反抗斗争。先是大批逃亡，后来便发展为武装暴动。到春秋后期许多地方都爆发了大规模的奴隶起义，逃跑和杀掉了不少奴隶主贵族。如著名的奴隶起义领袖柳下跖所领导的起义队伍，就有“从卒九千人”。所到之处，奴隶主贵族闻风逃窜。他在当时“名声若日月”（《荀子·不苟》），受到广大人民的热烈称颂。这种奴隶的斗争、奴隶暴动和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是摧毁奴隶制的决定力量。

在奴隶和平民斗争的打击下，奴隶制的“井田制”逐步瓦解。新兴地主阶级利用逃亡的奴隶和其他劳动人民，大量开垦私田，实行租佃制，提高了生产力。结果私田越来越多，封建的剥削形式和土地所有制日益兴起。公元前594年，鲁国不论公田私田，开始一律收税（“初税亩”）。这就等于承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随着生产关系的变革，新兴地主阶级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与没落的奴隶主阶级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他们要求变法革新，废除奴隶制的“井田制”，实行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废除“礼不下庶

人，刑不上大夫”的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实行“法不阿贵”、“刑无等级”的“法治”；废除“世卿世禄”制，实行因能授官，因功授禄，提高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地位和权力；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等等，一句话，就是要推翻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专政，建立和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专政。而没落的奴隶主阶级则不甘心自己的灭亡，残酷镇压奴隶起义和新兴地主阶级的改革，千方百计地维护和复辟腐朽没落的奴隶制。

这种没落奴隶主阶级同新兴地主阶级的斗争，在政治思想领域里，集中表现为儒家和法家的斗争。儒家是代表当时没落奴隶主阶级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一个反动派别。它推行一条“克己复礼”的复古、倒退的路线，顽固地维护和复辟腐朽的奴隶制度。儒家的创始人是孔丘（公元前551——前479年），由于他在年轻时从事过“儒”的职业（给奴隶主贵族办丧事，当吹鼓手），所以称这个派为“儒家”。同儒家对立的是法家，他是代表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一个进步派别。它实行一条革新、前进的路线，努力建立和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专政。因为这个派别主张“法治”，所以后人称它为“法家”。

春秋战国时期的儒法斗争，大致可以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春秋时期。这一时期，奴隶制日益崩溃，封建制日益兴起。以管仲、邓析、少正卯等为代表的法家先驱者同没落的奴隶主贵族及其代言人——以孔丘为代表的儒家，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斗争的中心问题是维护和恢复“礼治”还是实行“法治”，即是维护和恢复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专政，还是建立新兴地主阶级的专政。

第二阶段是战国初期至中期。这时，封建制已在多数诸侯国建立起来，新兴地主阶级反对奴隶制的斗争空前激化。以李悝、吴起、商鞅等为代表的法家同以孟轲为代表的孔丘的徒子徒孙们，展开了复辟与反复辟的剧烈斗争。斗争的中心问题是实行变法、进一步发展封建制，还是搞复古倒退、复辟腐朽的奴隶制。

第三阶段是战国末期。这时，秦王朝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时机已经成熟，以荀况、韩非、秦始皇、李斯等为代表的法家同以儒家为代表的复辟逆流，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斗争的中心问题是促进全国统一，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还是搞分裂割据，复辟奴隶主贵族的反动统治。

（一）春秋时期的儒法斗争

春秋时期，奴隶制开始衰落，当时一些有作为的政治家如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秦穆公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先后称霸。他们反对守旧，对周礼进行了一些改革，促进了国家的富强，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其中，齐国是新的封建生产关系发生较早的国家，齐桓公的相管仲（？——公元前645年），是当时一个著名的进步政治家，法家的先驱者。他帮助齐桓公进行改革，反对奴隶制的礼治，主张法治，实行以法治国。他提倡“农战”，比较重视发展生产，反对空谈礼义，认为只有仓库里装满粮食，人们的衣食充足，才谈得上礼义道德。（“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他还初步实行了按土地的多少、好坏收税的改革（“相地而衰征”《国语·齐语》），建立县、乡、邑等各

级行政机构，并把居民组织和军事组织统一起来。这些改革使齐国很快富强起来，“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初期一个强大的诸侯国。

到春秋后期，奴隶制已面临全面崩溃的局面。在奴隶不断暴动和起义的推动下，新兴地主阶级先后在各诸侯国同奴隶主阶级展开了激烈的夺权斗争。当时，在政治思想领域内，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势力的法家先驱者积极参与了反对奴隶制的等级制度（周礼）的斗争，并为其大喊大叫，制造革命舆论。而以孔丘为代表的奴隶主贵族代言人则顽固地维护周礼，鼓吹复辟倒退的反革命舆论，力图扼杀新生势力。

当时，郑国法家的先驱者邓析（公元前546——前501年）在奴隶起义的推动下，大力宣传“法治”思想，为争取和保护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而进行斗争。他反对儒家复古、倒退的路线，主张“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荀子·非十二子》），要求打破奴隶制的统治秩序。他反对奴隶主贵族吹嘘的什么“德治”，认为“天”和奴隶主统治者对老百姓没有任何恩德（“天于人无厚也，君于民无厚也”《邓析子·无厚》）。他也反对把奴隶制的周礼作为衡量一切言行是非的标准，而提出“以非（指违反周礼的言行）为是，以是（指符合周礼的言行）为非”（《吕氏春秋·离谓》）的新兴地主阶级的新的的是非标准。他还积极地为保护新兴地主阶级的经济、政治利益与奴隶主统治者展开斗争。当时郑国的奴隶主贵族在奴隶暴动和新兴地主阶级的斗争下，被迫颁布了成文法（“铸刑书”）。邓析便利用这一成文法，替新兴地主阶级和平民打官司（“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刘歆《邓析子》序）。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自己又编了一部体

现新兴地主阶级意志的成文法，把它写在竹简上，叫做“竹刑”。他用各种办法，包括类似后来大字报的方式，出政治揭贴，揭露奴隶主贵族的专横，掀起了一股革新的风潮，以致使“郑国大乱，民口喧譁”（《吕氏春秋·离谓》）。

邓析反对奴隶制的斗争，在当时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因此，一切反动保守势力对他恨之入骨，拼命地对他进行攻击和迫害。最后，郑国的反动奴隶主贵族下了毒手，以“诈伪之民”（同上）的罪名，杀害了邓析，并将其体砍成肉酱。

在郑国的奴隶主贵族杀害邓析的同时，鲁国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也尖锐化了。奴隶主贵族的代言人孔丘，对当时的“礼坏乐崩”，奴隶起义和新兴地主阶级的夺权斗争，恨得要死，怕得要命，把它咒骂为“天下无道”。因此，他极端仇视和疯狂反对一切新生事物。鲁国的季氏推行封建的税收制度，他大发雷霆，攻击它违背了“周公之典”（周礼）。但他无法奈何季氏，只好拿帮助季氏改革的学生冉求出气，宣布冉求不再是他的学生了。并煽动其他学生“鸣鼓而攻之”，去围攻冉求。公元前513年，晋国在奴隶们和新兴地主阶级的斗争下，铸了个刑鼎，颁布了成文法。孔丘听到后，竟气得发抖，痛哭流涕地说：“老百姓都可以按照鼎上公布的条文为自己辩护，怎么还能体现出贵族的高贵呢？贵贱的秩序都打乱了，怎么还能维持贵族统治的国家呢？”（“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贱无序，何以为国！”《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孔丘对从奴隶主贵族转化过来的地主阶级代表破坏周礼的行动，也感到不能容忍，如季氏“八佾舞于庭”，他就歇斯底里地叫喊“是可忍也，

孰不可忍也！”他甚至连酒杯的模样与西周时稍有改变，也无限悲丧地哀叹道：“酒杯不象了酒杯，酒杯啊！”（“觚不觚，觚哉！觚哉！”《论语·雍也》）。

相反，孔丘认为，“周礼”，即奴隶制的分封、等级、世袭等制度是丝毫不能违背的，更不能有所变更。他顽固地维护当时已经崩坏了的周礼，而且还梦想大开历史的倒车，全面恢复西周初期那种奴隶制“全盛时期”的局面。为了维护和复辟奴隶制，他提出了“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说什么一切视、听、言、动都不准违背周礼，并把“信而好古”当作自己的座右铭，一个劲地颂古非今，大嚷什么“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赌咒发誓要复辟西周奴隶制的“礼治”，大搞“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反革命复辟活动。

疯狂反对新生事物，竭力维护旧事物；反对社会前进，力图开历史倒车，这是一切反动派的共同特征。从孔老二到刘少奇、林彪一脉相承，都是这样。就在新中国刚成立后不久，刘少奇一伙就抛出反动电影《武训传》，竭力吹捧孔老二的忠实信徒武训，妄图用孔孟之道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国民党统治，投降帝国主义。毛主席亲自发动并领导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毛主席指出：“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象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毛主席的批判，一针见血地击中了孔孟之道复辟倒退的反动本质，揭露了刘少奇一伙吹捧武训的鼓吹孔孟之道的反革命目的。林彪再三挥舞“克己复礼”的黑旗，他也是要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新生事物，搞复古倒退，复辟资本主义。

孔丘是一个不学无术的政治骗子。他为了反对奴隶起义和新兴地主阶级的革新活动，东拚西凑到处搜罗奴隶主的反动思想武器，炮制了一套更富于欺骗性的以“仁”为核心的反动政治伦理思想体系。他在“德治”、“爱人”、“忠恕”等骗人说教下，拼命攻击革命暴力，咒骂奴隶们和新兴地主阶级变革旧制度、推翻奴隶主阶级反动统治的斗争是“不仁”。相反，却大肆叫嚣要“猛以济宽”，用反革命的暴力血腥屠杀奴隶起义，镇压新兴地主阶级的夺权斗争，大搞反革命两手。可见，孔丘所谓的“爱人”，就是吃人。就在他七十岁的时候，听到齐国的新兴地主阶级代表田成子杀了齐简公，他还痛哭流涕地要鲁哀公出兵去讨伐。

总之，孔丘以“仁”为核心的这套反动思想体系，完全是为他“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纲领服务的。因此，孔丘拚命地向他的死党灌输“仁”的思想，要他的死党“杀身以成仁”，号召没落奴隶主贵族死抱着奴隶制的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与新兴封建势力抗拒到底。他这种反动思想，后来为历代反动派所继承。从蒋介石到林彪，也都是用“不成功便成仁”作为他们训练反革命队伍的座右铭和“纪律”的。但是，历史上一切反动头子从来也没有一个实行过所谓的“杀身成仁”。蒋介石一群逃到孤岛上去，靠帝国主义的保护，苟延残喘。林彪也没有“杀身成仁”，而是仓惶出逃，投奔苏修，叛党叛国，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

孔丘还大肆鼓吹“中庸之道”，“礼之用，和为贵”等一套宣扬阶级调和、阶级投降的反动谬论，竭力反对新兴地

主阶级变革奴隶制的夺权斗争。这也是以后一切反动派反对社会变革，推行卖国投降的反动思想武器。林彪狂叫“中庸之道……合理”，竭力鼓吹“两斗皆仇，两和皆友”，就是为了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我们的反修斗争，为他复辟资本主义，投降苏修的卖国主义作论据的。

孔丘为了维护奴隶制的反动统治秩序，还抬出了反动的“天命”论，一方面论证奴隶主的统治是“受于命天”的；一方面吓唬奴隶们和新兴地主阶级，要他们“畏天命”，必须“安分守己”，一切“听天由命”。同时，他还大肆宣扬“惟上智与下愚不移”的先验论，天才论，人们要“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服服贴贴地听从奴隶主的统治，向那些天生的“贵人”和“贤人”屈膝。

孔丘为了颠覆鲁国的新兴地主阶级政权，他大耍反革命两面派手法，大搞韬晦之计，宣扬什么“小不忍则乱大谋”。他的反革命阴谋受到鲁国新兴势力打击后，又率领他的门徒，到处游说，自我吹嘘，寻求反动主子，勾结各种反动势力，结党营私，继续搞复辟活动。孔丘一生逆历史潮流而动，专开历史倒车，专搞阴谋诡计，是一个典型的复辟狂，政治骗子，大恶霸，寄生虫。

新兴的封建制必然代替腐朽的奴隶制，这是历史发展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鲁国著名的法家先驱者少正卯（？——公元前498年）继邓析之后，同孔丘“复礼”的反动倒退路线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少正卯当时在鲁国宣传革新的思想，影响很大，连孔老二的门徒也承认他是“鲁之闻人”。他在鲁国大力支持新兴地主阶级破坏周礼的革新活动，为推翻奴隶制大造革命舆论。他敢于斗争。孔老二招收学生，灌

输奴隶主的反动思想，培养死党。他就同孔老二唱对台戏，也招收学生，进行革新思想的教育。由于少正卯讲的是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新道理，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使得孔老二的学生也不愿听他那套陈词滥调，而跑去听少正卯的讲课。少正卯的宣传活动，在当时形成了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进步势力。孔老二对此怕得要死，拼命攻击少正卯是“小人之桀雄”。这恰好说明，少正卯是一个反对奴隶制的新兴地主阶级的杰出代表。在这样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中，孔老二手中无真理，便凶相毕露地诉诸反革命暴力。在他窃取了鲁国的司寇（主管司法的）后，代理宰相三个月时，“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竟杀害了少正卯。

孔丘强加给少正卯五条罪状（“五恶”）“一曰，心达而险”。实际上就是说少正卯通晓古今变革的道理，了解事物的变化，而且敢于造反，主张通过夺权斗争，进行社会改革。

“二曰，行辟而坚”。就是说少正卯不按奴隶制周礼的规定行事，而且坚决地走革新道路。

“三曰，言伪而辩”。就是说少正卯宣传反对奴隶制的革新思想，而且善于辩论，能把革新的理由说得头头是道。

“四曰，记丑而博”。就是说少正卯无情地揭露了奴隶制统治下的丑事和罪恶，而且掌握着大量的材料。

“五曰，顺非而泽”。就是说少正卯大力支持革新思想和活动，而且从理论上给以加工提高。

从复辟派的这些诋毁中，恰恰证明少正卯和孔老二之间的斗争，是革新与守旧、前进与倒退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少正卯的被杀害，说明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从来

就是不可调和的。同时，也充分暴露了孔老二这个不断鼓吹“为政焉用杀”的家伙，是一个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伪君子、两面派，是一个穷凶极恶的大恶霸、刽子手。林彪这个孔老二的忠实信徒，和他的祖师爷一样，也是一个“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反革命两面派、伪君子。

历史向前发展的总趋势是谁也阻挡不了的。孔老二及其所代表的奴隶主贵族虽然杀害了革新派人士少正卯和邓析，但法家先驱者所点起的革新火焰，是扑不灭的。在广大奴隶和劳动人民反抗奴隶主统治的巨大力量的推动下，新的更大的社会革新浪潮更加蓬勃地开展起来。而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孔老二，却使自己声名狼藉，到处碰壁。如同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奴隶起义领袖柳下跖痛斥了他这个“妄称文武”，开历史倒车，祸国殃民的“盗丘”，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他这个“矫言伪行”、“好面誉人”的“鲁国巧伪人”的骗子面目。揭露了他是一个不学无术、到处拨弄是非的“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吸血鬼。柳下跖最后痛斥说：你孔丘讲的那套“仁义道德”，都是用来骗人的。你自我吹嘘是什么“圣人”，可是你两次被鲁国赶走，在陈蔡被包围，饿扁了肚子，到处奔跑，四处碰壁，就是因为你搞的那套说教都是糟粕。你罪大恶极，死有余辜，赶快滚开。柳下跖痛斥孔老二，显示了劳动人民批孔斗争的巨大威力。最后，孔老二只好在绝望的哀鸣中，活象一条断了脊梁骨的“丧家之狗”，带着花岗岩脑袋见周公去了。

（二） 战国初期到中期的儒法斗争

从战国初期到中期，是新兴地主阶级进一步开展夺取政

权和巩固政权的斗争，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进行全面大变革的时期。当时，由于各个诸侯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斗争的反复性，新兴地主阶级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变法革新运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空前激化了。这时，法家和儒家，围绕着夺权和反夺权、复辟和反复辟的问题，展开了反复的、尖锐的斗争。其中主要的有以下三次：

一次是战国初期魏国的变法。孔丘死后，战国初，他的徒子徒孙们钻到各诸侯国，进行反动宣传，反对法家的变革。当时魏文侯任用法家的主要代表李悝（约公元前455——395年）为相，主持变法。而孔丘的大徒弟之一子夏及其门徒就一个劲儿地教魏文侯读儒家的“经艺”，竭力阻挠和反对变法。李悝对此进行了斗争。他在经济上提出“尽地力”、“善平糴”（音狄）的主张，采取一些措施巩固和发展封建经济，提高生产率，增加封建国家的收入。在政治上则实行“法治”，提出“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说苑·政理》）的原则，取消维护奴隶主贵族特权的世卿世禄制度，大力提拔和重用新兴地主阶级势力。为了实行“法治”，他还编了一部《法经》。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封建法典，对秦汉及以后的封建立法都具有一定的影响。由于李悝在魏国贯彻了法家的路线和政策，因而使得魏国在战国初期成为一个强大的诸侯国（“行之魏国，国以富强”《汉书·食货志》）。李悝在魏国的变法，一开始就是在同奴隶主贵族的破坏活动作斗争中进行的。这从《法经》的佚文中，发现有包含镇压奴隶主贵族的条款，就是证明。

就在李悝变法的同时，魏国法家西门豹用唯物主义无神

论，同维护奴隶主利益的儒家有神论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当时，魏国邺（音业，今河南安阳市北）地的一些奴隶主恶霸势力，利用河水泛滥，造成灾害一事，编造了一个“河伯娶妇”的鬼话。他们胡说，河神每年要邺地人民挑选一个民间妇女投入河中作为妻子，不然，河神发怒，水淹邺地，就要遭殃。他们用这种迷信来蛊惑人心，趁机榨取百姓钱财，残害妇女。当地劳动人民被迫大量逃亡。结果造成土地荒芜，生产下降，人民贫困，破坏了新兴的封建制度。西门豹当了邺的县令后，坚决推行法治，坚决而机智地对奴隶主恶霸和巫婆进行了严厉镇压。他借口巫婆挑选的女子不好看，要巫婆去向“河伯”报告，等选好后再去，一下子就把巫婆抛进河里。巫婆一去不返。他又说，请巫婆的弟子去看看。于是又一连把巫婆的三个徒弟扔进河里。最后，还把一个恶霸头子“三老”也扔进河里。这时，那些恶霸们都吓得“色如死灰”，趴在地上一个劲地叩求求饶，头都磕出了血。从此，这些家伙再也“不敢复言为河伯娶妇”。西门豹这个斗争，有力地打击了奴隶主恶霸势力。之后，他又大力宣传无神论思想，积极领导邺地人民向自然灾害展开斗争，开凿渠道，引漳河水灌田，使得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据《淮南子·人间训》记载，他在治邺时还实行寓兵于农，存粮于民的政策，有力地巩固了新兴的封建制。西门豹治邺，是魏国新兴地主阶级变法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法家无神论战胜儒家有神论的一次大搏斗。西门豹是一个法家，又是一个很大的无神论者。他的无神论思想为以后荀况、韩非等法家所继承和发扬。由此可见，法家主张变革、前进的政治路线，始终是同唯物主义、无神论的思想路线联系在一起的。

另一次是吴起（？——公元前 381 年）在楚国的变法。吴起和李悝同时，早年曾同时在魏国做过官、任西河太守，屡建战功。他很会打仗，著有兵法，既是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之一，又是当时著名军事家。后来他到楚国，为楚悼王信用，担任令尹（相当于后代的宰相）进行变法，同楚国的奴隶主贵族势力展开了斗争。他认为，楚国奴隶主贵族的权力太大了，分封的世袭领地太多了，不利于封建君主和新兴地主阶级，这是国家贫弱的根本原因。（“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若此则上逼主而下虐民，此贫国弱兵之道也”《韩非子·和氏》）。因此，他针对儒家“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提出“明法审令”，实行“法治”的革新纲领。他坚决主张废除“世卿世禄”，取消旧贵族三世以后的爵位和俸禄，并把一些奴隶主贵族赶到边远地区去开荒，使得这些骄奢淫逸的家伙狼狈不堪（“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皆甚苦之”《吕氏春秋·贵卒》），沉重地打击了腐朽反动的奴隶主贵族势力。楚国原较落后，经过吴起变法，政治上有进步，生产也有发展，一度成为战国初期仅次于魏国的第二个强国。但奴隶主贵族是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他们仇视一切变革，仇视吴起所代表的法家，力图加以阻挠。楚国的一个大奴隶主贵族屈宜臼，搬出孔老二的那套复古倒退谬论，狂叫“善治国家者，不变故（古），不易常。”他竭力反对吴起的变革措施，认为废除“世卿世禄”制度“是变其古而易其常也。”（《说苑·指武》）他大骂吴起“大逆不道”，并以必将酿成“大祸”来威胁。吴起没有屈服，仍然坚持法家路线，积极实行变革。后来楚悼王刚死，楚国的反动奴隶主贵族便发动了反革命政变，用乱箭射死了吴起，又扼杀了